

近日，甘肃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乡镇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整合基层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方案》提出，上级部门不得以签订“责任状”、分解下达指标、考核验收等方式，将工作责任转嫁乡镇和街道承担。

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手段，上级在关键领域、关键节点、关键事项上，与下级签订责任书，不失为抓落实的一种好方法。但近年来少数地方滥签责任书，把“压实责任”简单化，将本应承担的责任直接推给最基层，变成“责任转移”，可谓形式主义的高级变体。

“治理责任书满天飞，既要靠转变作风，改进工作的方式方法，更要靠完善责任分配、传导的有关制度和机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韩春晖对记者说。



责任书出现泛化苗头

不久前，媒体报道，某地为“层层压实责任”，把高速公路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到村，与村委会签订责任书。村支书哭笑不得地说：“我们连高速公路都上不去，没有执法权，咋去管理呢？”

类似把责任书不切实际地签到乡镇、社区、村的事，近年来时有发生。

“现在给基层减负，汇报材料薄了、会议少了，但背负的责任书多了。”云南省红河州一位镇政府负责人反映，“2019 年，我们与上级签了 15 份责任书，除安全生产、食品安全、防汛抗旱外，还有党风廉政建设、综治维稳等等。”

四川省资阳市纪委监委日前公布的一份调研结果显示，2018 年，全市各级部门层层签订责任书总数超过千份。其中，仅乐至县龙溪乡的一个村就签了 33 份。

2020 年初，四川省简阳市纪委监委深入基层走访时发现，一些部门依然存在随意设置责任书、“一票否决”事项的情况。截至 3 月 30 日，已取消镇街过多过滥的责任书 19 项、“一票否决”事项 5 项。

记者调研发现，少数地方出现责任书泛化苗头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政绩观错位。少数管理者缺乏担当，做二传手，把上级布置的任务切块，通过签订责任书方式直接派给下级。如此，各级共同任务变成基层的独家任务，共同责任变成基层责任。

其二，滥用考核指挥棒。近年来一票否决在一些地方增加。除了中央明确实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安全生产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风险、党风廉政建设等项目外，一些地方还加入了教育科研、物价涨幅、城镇建设、税费征收、招商引资等事项。

在安徽中部某市，一个区政府将治理住宅区油烟纳入一票否决项目；在一些地方，报刊征订、档案管

理等工作也要一票否决。

其三，相关考核监督机制不健全、不严密使滥签责任书者得不到追究，以致一些空对空的责任书更加泛滥。有些地方年初签订的责任书，年底时没有统一核验完成情况，对完成不好或者没完成的没有进行调查和追究，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没有给予处罚。一些涉及重大民生问题的责任书缺乏透明度，老百姓知情权、监督权不足，这种责任书容易落空。

责任书成为“责任白条”

“上面千根线，基层一针穿”。乡镇工作繁杂而具体，如果上级部门简单地以责任书推动工作，基层落实不了，就可能成为“责任白条”。

2018 年 11 月，浙江省纪委督导调研组在明察暗访时发现，上级以责任书形式布置给乡镇的任务越来越多。比如，从浙江省杭州某街道提供给媒体的一份科室职责划分表上看到，一个城管科不仅要负责街道区域内序化洁化绿化亮化管理、动植物疫情防控等任务，还要负责文物保护、废旧物品回收管理等近 20 项工作。还不包括要协助职能部门完成的工作。

让城管科苦恼的是，其中许多工作都需要具备专业技能才能处理，而一些部门并没有提供相关指导培训。

记者调研发现，有些部门认为责任书签了，责任就下转了。事前指导、事中管理都跟不上。

责任书主要包含三方面含义，一是“确责”，即明确签订者对某方面事务负有责任。二是“履责”，既然签了就要落实，就要按照“白纸黑字”的内容去做。三是“追责”，如果签了字、作了承诺，但没有做到，就要被追究履职不力的责任。

记者调研发现，在个别地方，虽然与煤矿企业都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但内容几乎一样。而每个煤矿的年产量、生产条件、员工结构、所处自然环境等均不同，安全生产的具体责任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细化明确，对日常监管和问

题解决作用有限。

“不管部署什么工作，都让基层签个责任状，其实也是一种形式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沈友军认为，“责任书泛化，根源在于绩效考核制度不完善、不科学，容易助长官僚主义作风。”

“签责任书的层级越多、签订责任主体越低、使用的范围越广，越减损其严肃性。”沈友军说。

给责任书“减减肥、瘦瘦身”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落实责任，应提高管理水平，分清轻重缓急。

一方面，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该一票否决的绝不含糊，同时给“空、虚、飘”的责任书“减减肥、瘦瘦身”。

另一方面，完善责任分配、传导的有关制度和机制。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吕芳认为，责任书的制定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建立在事权合理划分的基础上，不属于基层政府的事权不能进入责任书，否则容易造成上级政府部门的责任推诿。二是属于基层政府的事权，创造条件让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配置也要与事权相匹配。三是绩效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长期的战略规划，需要明确年度绩效目标与当地战略规划的关系。

“在制定目标时要因地制宜，切合实际，内容具体可操作，不提过高的要求，让责任实打实。尤其应在业务指导、执法支持、人员培训等方面给予基层更多帮助，并严格抓好定责、督责、追责三个环节，环环相扣、层层压实、紧迫倒逼，让责任归位。”沈友军说。

“善于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加强对过程性督查考核的综合分析和科学研判。”沈友军说，“可发动群众参与到对责任书落实情况的督查考核中，采用问卷调查以及第三方评估等方式，让群众说得上话，说话管用。”

(据新华社)

“拼爹科研”背后的利益江湖

继小学生研究癌症获奖引发争议后，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下称科创大赛）又被曝出连续 3 年获奖的学生涉嫌“拼爹科研”，科创大赛“神娃”是如何出现的？科创大赛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江湖？记者对此展开深度追踪。

科创大赛是由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等 9 部门共同主办的全国性青少年科技竞赛，初衷是在孩子年少时深植科学、科研意识，带动孩子发展创新、创造能力，培养一批具有科研潜质和创新精神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后备人才。自 1982 年举办以来，科创大赛已举办 34 届，今年 7 月 20～26 日举办第 35 届。

7 月 20 日，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竞赛主办单位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全面开展一次自查，对以往获奖项目的真实性、独创性进行复核。要坚决避免参赛项目明显不符合学生认知能力现象的发生，坚决防止由家长或其他人代劳等参赛造假行为。”

严查之外，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异化了科创大赛？

人小“才大”悬疑多

“3D 打印”“同步辐射”“基因序列”“巡检机器人”“南极半岛”……这些高科技词条频频出现在科创大赛低龄参赛作品里，让一些硕博感慨“后浪可畏”。

一位博士说他最初看到荣获第 34 届科创大赛一等奖作品《基于同步辐射技术对提高镁合金硬度的热处理过程的研究》时难掩惊讶：“要知道，能产生同步辐射的物理装置，全国也不过几台而已，大多数高校教授排队一年都未必能用上，而来自东莞的高二学生竟然有大把时间亲自操作仪器进行原位研究。”

仔细一查却有蹊跷。据前述博士介绍，该获奖项目作者曾某 2019 年还和周某某联合在《航空材料学报》发表了一篇《基于同步辐射技术的 WE54 镁合金原位时效研究》论文。曾某为第一作者，周某某为第二作者。经查，周某某系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其导师恰姓曾，且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期从事合金强化理论方法与镁合金设计制备。

前述博士不禁发出一连串疑问：高二学生如何对生僻的镁合金时效研究产生兴趣，并且从立意上敏锐地站到了同步辐射研究这么高的层次？曾同学“机缘巧合”来到了同姓曾的课题组进行试验，而发表文章时的通讯作者为博士生，曾老师为何不当通讯作者？

“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科技部门一位内部人士透露，目前在知网上查到的往届获奖的科技型论文，其中有一部分是明目张胆抄袭，轻松就能找到抄袭原文。

据了解，除抄袭论文外，还存在部分“套牌论文”“代工论文”，它们由学校指导教师、家长、高校实验室导师干预、代劳。有高校教师爆料说，身边不少同事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安到孩子身上，让孩子到实验室拍个小视频，把早已备好的台词说一遍，拿简单的实验器具装模作样操作一下，然后就去参加科创大赛。“在省里得奖是没问题的，到全国参赛也能得三等奖或二等奖。”该高校教师说。

一名中学科技教师告诉记者，初中以下学生的科技创新作品不少是科技老师做的，只是告诉学生怎么解说，很多发明、成果没有太多实用性和市场竞争力，只要制造一个噱头、做出一个样品、融合一些科技原理，就能拿奖。

“套牌论文”“代工论文”背后是否存在腐败默契

这些科创大赛赛角里的隐秘事，在相关利益者中其实心照不宣，甚至形成默契。

“学生参加比赛获奖升学时能加分，学校能从科协每年获得一笔资金，保住科技示范校，指导老师也可得到更多奖金。”一位小学教师告诉记者。

该小学教师表示，其所在学校有一位备受瞩目的“小小发明家”，他妈妈是学校里的一位名师，爷爷是一位退休工程师，帮他做的各类发明均挂靠在学校科技老师工作室里，“孩子得奖，老师出成绩，学校也脸上有光。”

高中生在科创大赛中的获奖回报更大更直接——在高校自主招生中加 20 分。

一些科研人员和相关部门领导的子女最易“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他几年前在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公示的普通高校招生加分考生名单上看到，有 4 名考生因科创大赛获奖得到高考加 20 分，而这 4 名考生的家长都是当地官员——一位是区教育局党委委员，一位是区科技局局长，另两位分别是市信访局副局长和某街道党委书记。

这种利益驱动也让高校成为“套牌论文”“代工论文”的重灾区。“在大学实验室里，一些硕士干的活都不知道是为哪位关系户干的。我之前待的实验室，每年暑假都有学校领导的子女、不明关系户，由导师亲自为其设计实验，然后安排硕士生替其做实验、为其代工，这些关系户的孩子基本不来实验室，只要熟悉下实验步骤就可以了。”一位高校硕士生说。

该高校硕士生表示，他就曾替某领导的女儿做过科研项目，领导女儿凭借该项目参加竞赛发表论文，很轻松上了好大学。

也有个别硕士、博士在利益驱动下，对自己的 SCI 论文或发明专利有偿收费，价格依据成果等级从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反正论文、专利被抄袭、剽窃，也不会影响原作者毕业，而科创大赛的参赛时间在硕士博士论文发表之前，即使数据库查重也会有时间差，这就给了‘套牌论文’‘代工论文’可乘之机。”一位高校科研人员说。

尽管今年取消高校自主招生，让获得加分被高校录取的行情看跌，但业内人士分析，家长和学生参赛的热度不会大减，毕竟科创大赛获奖对新高考要参考的综合素质评价，以及出国留学申请都是光鲜的“资本”。

一些网友直言，“要严防青少年科创大赛异化为‘青少年爹妈科创大赛’，谨防青少年科创大赛颁奖典礼变成少数人权力寻租的秀场”。

评审机制为何层层失守

更让人忧虑的是，这些“一眼假”的“套牌论文”



大赛的公正性。

再次，评委组成不甚完善。多位受访者认为，科创大赛涉及十多个大类，细分领域更是不计其数，要真正评出作品的科技含量，并确保审核的真实性，往往对评委组成要求很高。但在目前赛制中，评委的选择、产生机制、专业分布、构成人数暂无要求，尤其是对有亲属、师门关系的选手和评委之间，如何执行回避制度等，有待进一步明确。

最后，计分、报送、展示等环节不够透明。从计分规则看，有评委透露，他们给组委会上交完初评的评分表格后，就不再参与后期计分、统分、排名，组委会后续也未有程序上的公开公示，其间是否会存在“改分”“内定”等不得而知。

另从作品报送和展示程序看，一位高校科研人员说，不管区赛、市赛、省赛还是国赛，所有参赛作品、获奖作品的申报资料、论文、成果都是内部报送，展示环节也仅有小范围观众和评委看，即使获奖结果公布，也只能看到项目名称、摘要等简要信息，详细内容不会公开、上网，“问题”项目恐难被公众监督。

业内人士表示，上述因素增加了科创大赛的注水空间和注水成分，一定程度上让科创大赛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捍卫风清气正的科创环境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丁加勇担心，异化的科创大赛得不到及时匡正，科学成果会变成一些人攫取利益的工具，助长学术剽窃之风，滋长不劳而获风气，甚至打击孩子们对科学的淳朴热爱。

一位科技指导老师坦言，他教的一些热爱科学、刻苦学习的学生对科创大赛已失去兴趣，有的学生甚至表示“再也不去参加这样的比赛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湖南大学副校长谭蔚泓说：“青少年科创作品是一类极富生命力的知识产权，值得保护和鼓励，同样也要经得起科学的审视与检验。”谭蔚泓认为，遏制科创大赛异化，需尽快打破科创大赛的信息孤岛，建立科创大赛参赛作品的公示机制，将作品内容纳入公开数据库，完善“赛后倒查”机制，实现阳光下的透明评选。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赛后倒查”机制不仅要按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规则（2020 年修订）要求，对存在抄袭、研究工作作弊的取消作者获奖资格，还要进一步追究参与腐败的相关利益者责任。同时明确评委的责任追究机制，如果赛后发现抄袭论文、“套牌论文”、“代工论文”，应追责没有把好关的评委，倒逼评委审慎行使手中权力。

他们坚信：“只有增加涉事者的违规成本，才能对违反规则者构成威慑，捍卫风清气正的科创环境。”

(据新华社)